

## 21 世纪伊托邦时代的文学新符码<sup>①</sup>

凌 逾

**摘 要:** 在网络科技高度发展的伊托邦时代, 港台作家善于化用新奇的虚拟赛博网络空间元素, 再现伊托邦、乌托邦、恶托邦交织的 E 时代想象, 创造新时代文学新符码。新生代及中生代作家们的创作印着强烈的代际符号, 他们发明了杂唛时代的新人学, 为 21 世纪文学开创了一条新的想象之路。

**关键词:** 伊托邦, 恶托邦, 赛博空间, 新符码, 新人学

**DOI:** 10.13760/b.cnki.sam.2015.01.002

### New Literary Codes in the E-topia Era

Ling Yu

**Abstract:** Integrated into a highly developed network society, writer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are adept at making use of new elements in cyberspace to imaginatively represent the E-topia era; they produce hybrid images interweaving E-topia, utopia and dystopia. The young and middle-aged writers in this hybrid era, whose works are strongly marked by intergenerational signs, have invented “neo-humanism”, a new approach to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.

**Keywords:** E-topia, dystopia, cyberspace, new literary codes, neo-humanism

当今时代的符号是什么? 如何命名这个时代? E 时代 (electronic age)? S 时代 (screen generation)? D 时代 (digital age), 还是大数据时代 (big

---

<sup>①</sup>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“香港跨媒介文化叙事研究”(13FZW047) 阶段成果。

data)? 一时难有定论。时下有三股力量推动着跨界业的多元发展,一是全球人员的流动移民,二是科学的融合,三是电脑数码技术的飞跃。在人类文化传播的三个阶段中,口传和印刷发展缓慢,数字网络电子化的发展则呈指数速度增长。刚兴起不过百年左右的影视传媒,已经被扫入传统之列。传统、现代和后现代换代越来越快。今世资讯以光速流行,手机、网络、Email、DVD、MP4、ICQ、QQ、博客、微博、微信等,成为今人备件。哈乐薇(Donna Haraway)创设新术语:赛博(cyborg),人机合体,社会现实与政治建构、改变世界的科技、虚构的叙述相混,形成新的人机一体经验,不再是“阶级的支配系统”(hierarchical dominations),而是“支配的知性系统”(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)(廖炳惠,2006, pp. 58-61)。全球互联网催生出由计算机支持的多维度、人工虚拟的现实,形成了浓缩时空的新数字空间(time-space compression)、虚拟赛博网络空间(cyberspace)(黄奋鸣,2004, p. 487)。随着网络数码、互动影像兴起,人们在虚拟空间开辟社区,形成前所未有的线上人际网络(廖炳惠,2006, p. 57)。

酷,是当代青春期的符号,见诸服饰、体饰、俚语、吸烟、音乐偏好等,再不是嬉皮、迪斯科、朋克、嘻哈时代,今日年轻人成长于数码时代,在网络海洋中游刃有余,人称网络原住民(包尔连,2012, pp. 25-26);而余者则为网络新移民,置网络于次要地位。如果说,老派文人精研琴棋书画、医卜星相,多以纸笔方式,字斟句酌地写作;那么,当代文人已改头换面,精研技艺为电脑网络、高科电子、天文地理、旅游饮食、动漫话剧等,拍客族常按快门,新生代多用电脑随擦随改地写作,手稿将成为绝迹的稀有物品。如果说,香港中老年作家实验空间叙事,以世界的空间游历为主;那么,青年作家则以虚拟的空间游历为主。青少年日益远离广播影视,变得网络化、虚拟化。廖伟棠指出,香港“80后”,与网络共生,仗电游行义。突变式觉醒的人,成为一撮时代的人中之盐(廖伟棠,2011, p. 48)。时代脉动信息,要到新人类作家中寻找,如潘国灵、谢晓虹、韩丽珠、廖伟棠、雨希、王贻兴等,他们创设N合一媒介融合 of 香港文化符码,创意丰富。本文意在挖掘赛博后现代小说创设了哪些新人学、新符码、新元素。

## 一、伊托邦是乌托邦还是恶托邦?

新科技,给人们的生活方式、行为习惯、思维方式带来新变化。香港新生代笔下世界焕然一新,全套新版语言,打下时代烙印,文学令城市变得不再短视、单一。如邓肇恒的《天使的日常生活》说:“当快闪遇上永生,天使

的时间观和价值观也开始变态失衡……天使代表终于给上帝拨了一通标榜收费最便宜的 3G 长途电话, 希望兜口兜面、绘声绘影地告诉它, 自从天使失去了翅膀和光环之后, 取而代之的只是无处不在的电子荧幕和满街满地的 N95 口罩……而上帝却将电话接驳到留言信箱。”(张美君, 2005, p. 23) 年轻作家想象新世界, 一派 E-topia 时代气象。E-topia, 由米切尔所创(2001), 他认为, 几千年来, 人类经历了三次演变, 从水井中心到水管中心到网络中心, 从壁炉到电路和供热管线到信息高速公路, 从听佛祖演讲到印刷文化到电子百科全书, 在如今的后信息时代 (post-information age), 因特网成为新铁路, 硅成为钢材, “世界贸易由传统原子 (atom) 交换飞跃为当前比特 (bit) 交换, 不再输送笨重的商品质量 (mass), 而只要输送即时而廉价的电子数据, 信息成为举世共享的资源”(尼葛洛庞帝, 1997, p. 12)。1963 年拉里·罗伯茨发明的互联网, 技术以指数增长。未来电子产品能根据个人喜好, 度身定制, 变得更有互动性, 更人性化, 既有实用功能价值, 也有文化美学价值。米切尔的《比特之城: 空间·场所·信息高速公路》、尼葛洛庞帝的《数字化生存》等, 都对新时代抱着热切的期望态度, 俨然乌托邦时代到来。

但是, 安德鲁·芬伯格却创设了恶托邦 (Dystopia) 术语, 认为科技成为给人类带来恐惧的恶魔, 是世界末日、历史终结的元凶 (Feenbery, 1995, p. 14) 尤其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文化描述科技文明, 出现末世论 (eschatology) 主题, 法兰克福学派也对科技文化持批判精神。恶托邦思想源于原子弹战争、越南战争、美苏冷战, 开发太空而引发的科技和军备竞赛, 更早则源自赫胥黎和奥威尔科幻小说的反乌托邦, 由此激发出忧思。电影《V 字仇杀队》讲述在未来的伦敦赛博空间, 人们失去话语权, 生活在恐怖之中, 唯有赛博人化身 V 敢于站出来反抗, 推翻荒唐的统治, 炸毁伦敦标志性建筑, 唤醒民众的反抗意识。Utopia、E-topia、Dystopia, 尽管三词的词根都是 “-topia”, 但意思差距甚大。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, 《庄子》称之为 “无何有之乡”, 柏拉图《理想国》描绘过, 1516 年莫尔也写过《乌托邦》(Utopia)。在伊托邦时代, 当代艺术家既不会只唱乌托邦赞曲, 也不会只吹响恶托邦挽歌, 而多再现两者交战、冲突抗衡, 反映对未来的忧思或希望, 既有正面乐观论, 也有负面悲观论。E 时代有并发症: 既给人带来了快捷方便、互动交流、速度自由、弹性工作制、自我掌控感、合作创新精神; 也让人成为低头族, 患上科技脑过劳症、拖延症, 一切都随传随到, 按键即得, 今人是否变成思想薄饼人 (pancake people)? 娱乐至死? 被 google 变成

pigs? 新术语、新概念、新事物，给文学带来新热望、新图景，也带来了新焦虑、新忧思。

其实，老一辈香港作家也尝试数码网络虚拟叙事。如昆南的《ICQ 以外的界面》，叙述人物苏豪 SOHO 的意识流，挣扎于是否离开此城，听到“恐怖大王从天而降”的分贝，感到女友薇子冷漠得快要变成机械人，肌肤不时闪着电光，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械人，身体内几个器官在复制中。医生告诉他可以“随心所欲同步传输，适应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规划区域”。SOHO 按着电脑键，“不想建造什么大厦、地下商店、天桥，而想造个能独立思考的人，不，还是要张到处通行的 SMARTCARD，但，来不及了，荧幕上已跳出了几个 3D 英文字母：SimCity2000……GAMEOVER”（许子东，2001，pp. 188-192）。其实，早在 1961 年，昆南的长篇《地的门》，就在人物叶海意识的流中，穿插描写各种信息、各类旧报纸的成千上万条消息，世界与九龙共同呼吸，科技灾难、太空试验，还有异教徒宣扬世界末日的预言，引起民众恐慌。（2010，pp. 80-81）昆南对科技文明的恐惧由来已久，有恶托邦情结。

香港年轻作家们对新科技爱恨交加，辩证思考。如萧恒的《爱恨手机电邮间》认为，后现代人觉得手机电邮、SMS/ICQ 等通讯科技限制了人的自由，但失去它们又感到彷徨难受，城市人依赖科技来沟通，但这沟通却只接近，而没有交流。不接电话、不回邮件，成为现世的第八宗罪：“手机作响、电邮催促，只觉死线太多，时间太少，却不知为何要如此匆匆。我们就此化为一粒堕落在时间框架中的沙子，迷失城市当中。”（张美君，2005，p. 106）汤文锋的《假如摄影机没有撒谎》，将社会乱象隐喻为球场嘉年华，并有无数台摄影机，以数不尽的焦点，一起说、看、唱、念、造故事。但机械永不能撷取整个真实，从任何角度看都会偏颇主观；随意抽取的片段，可以营造出不同的解读可能，数字与数字之间的真伪，也不是一条容易计算的方程式。邓肇恒的《天使的日常生活》得灵感于 2004 年香港电影节上映的拉乌·卢易兹电影，该片的疯癫女主角认为：每个跌堕的人也就是天使。根据这荒谬颠倒的理论，那么，香港如旅游局所言，简直就是天堂，折翼天使流连于城市，感悟日常，堕落天堂依然奉行大鱼吃小鱼的堕落惯例。小说与电影互相影射，跨界想象叙述，富于超现实的精神，插科打诨，反讽辛辣。魏家欣想象未来 2029AD，比较悲观：“在一个新陈代谢率快到成为病态的城市，腐烂的速度在我们发现之前早已失救，这形成了诡异的情景，那是种延误，既然那是未来，是远处，我们愈向前行、城市愈苍老，就愈跟未来同步，影和像才能归

位……时空归位，未来的实景与昔日的电影重叠。每天喝着孟婆汤的城市回魂了，在世界各地找寻新的躯壳转生……城市是灵魂、是鬼、是身体、是攻壳，无限次出死入生：存档、复制、贴上、删除、预览、上传、超链接、防火墙、病毒过滤、数据还原、系统入侵、容量压缩、非法转载、虚拟服务器、记忆体备份、多机种模拟……”（2005，p. 88—92）这些想象得灵感于押井守电影《攻壳机动队》，该片以香港为蓝图，用怀旧的香港，象征未来的香港；用褪色过期的老城市，表述前卫科幻的新都会。出身广州的曹斐设计过未来城市动漫——《人民城寨 RMB city》，展现于美国林登实验室（Linden Lab）创建的全球最大虚拟世界平台“第二人生”（second life）。该作碎片化拼贴海洋城、鸟巢、东方明珠、熊猫、摩天单车轮、塑胶桶承载高楼等各种时代符码，画面色彩丰富艳丽，俊男美女人物养眼，矛盾整合具有狂欢化、娱乐化色彩，以虚写实，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和艺术形态的状况，也有揶揄反讽，但是，总体来说，还是对 E-topia 新时代充满了欣喜的憧憬。大陆新人类跨界的丰富动漫想象，已有赶超香港之势。

“我几年的心血，就全在这片指甲里了。请好好保管。”潘国灵的《无休止的缩小》（2010，pp. 132—134）俏皮地说。所谓指甲，即容量 32GB 的 USB 储藏器。“还有很多空位，我写一世的文字，也填不饱一片指甲。”小小晶片储存无限大的世界，可谓针尖上的天使。叙述者从父亲的年老缩水，想到父子的阅读审美代沟，再感悟到：“无休止的缩小，是世界不可逆转的必然命运，身体、字母、文学，一同走向缩小的末路。我想象自己也一点一点地缩小，直至无人察觉。”全文笔调起初戏谑，转而忧郁，省思恶托邦图景。1999 年电影《十三度凶间》（*The 13th Floor*，又译《异次元骇客》）也探讨晶片世界，依据 *Simulacron-3* 小说改编，反思寓言式话题，即柏拉图主张的“真实的世界只存在人们的想象之中”。科技进步，所有物事，如核弹试爆都能在晶片中模拟，虚拟世界给人类带来便利，提供海量资讯。但万一虚拟世界自我进化有了智能，超出人类掌控范围，人工智慧主宰人类智慧，模糊了虚实界线呢？在当代的中西小说和电影中，恶托邦的噩梦挥之不去。

## 二、新时代符号学

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符码代号。港台作家们善于撷取时代元素，创出新眼界和新符号学类型。例如，（1）苹果符号学：潘国灵小说《咬恋》（2010，pp. 19—32），讲述“我”与女孩偶遇于星巴克咖啡店，因使用同型号的苹果笔记本电脑而相互吸引搭讪，讨论苹果商标为什么是被咬了一口的苹果。女

子说是因为偷吃禁果；“我”说灰黑商标多年前本为彩虹色，这个同性恋标志，本为纪念奠定电脑数理基础的“人工智慧之父”艾兰·图灵（Alan Turing）。在 20 世纪 50 年代，麦卡锡主义兴起，同性恋者和共产党人受迫害，他服毒自杀，留下咬掉了一口的苹果。所有爱情始于暗示召唤：宋代词人周邦彦被佳人以橙挑逗——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”；今天“我”被少女以苹果引诱——“苹果就这样被咬了一口”。两人因苹果而结缘，苹果女孩爱咬东西，咬指甲、咬吸管，进而咬“我”的身体，“咬癖”促进恋人的私密感情，就像苹果商标。鲍德里亚说：“为了某种社会地位、名望、荣誉而进行的消费是符号消费。”（2001, p. 26）苹果，凸显出符号价值，成为社会圈层互认的身份标识、情感共鸣项。但后来，苹果女孩竟开始咬女子，咬了代表永恒欲望的彩虹苹果，还声称有完全不同的口感。“我”斥之曰：“你爱的不是人，你是恋物狂。你把我当成物件。”因苹果而起的咬恋最终土崩瓦解。在液态时代，爱情只能飘忽；就像苹果手机风靡，更新换代总如一阵风。各类之物，共同之处都是记号。潘国灵巧用新媒介记号，开创苹果爱情佳构，独树一帜，反倒长存。

（2）手机符号学：潘国灵酿造出佳作《我城 05 之版本零一》，才情尽显。主角阿果是新媒体传播学的大学生，和女朋友通过电邮谈爱，师生们课堂上讨论万维网、电子民主、人民电台等，话题跟时代接轨，未落后于时代半拍。他们为手提电话下定义：国际漫游器，多功能机器，偷窥器、监察器，音乐盒，教室、电影院、音乐厅的骚扰机器，申冤求救器，定位追踪器，消灭思念器，消费情报站，废话谎言生产器，短信作家生产器，口擎擎狂人日记机器……答案异彩纷呈，极富想象力。无独有偶，自称恐龙伯母的台湾作家朱天文《巫言》也探究手机，还点出其性别文化意义，如绝对女性的“李氏手机人类学”：“长发女生穿高跟露趾鞋，短窄裙。机子改装后呈果冻色，挂满一串凯蒂猫、趴趴熊、南方四贱客、小丸子，外加一个女生兮兮的珠织手机袋。屏幕亲密红色紧迫盯人，一天照三餐打，没营养的情绪，绝对值得用最昂贵青春来换。她逛街杀价的嗲声，她接到电话的长尾音喂——粉红恋人-GD90。”（2009, p. 117）整段简直是阴性火星文天书，写活了商品美学，活化新式闷骚女的乔装作致。富有女性特质的男生，则爱用 T28 型，第一只锂电池超薄机，禁得起他们的自由。从潘、朱的手机符号学书写来看，性别差异大于地区差异。手机仍在持续发展，像变形金刚般百变，最初是大哥大、大水壺，如今愈缩愈小，将小到能植入人体，或与电脑网络整合，成为新式电脑手表、时尚饰品。移动手机移动了人类的生活，并对文学叙事内容、形

式和承载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(3) 电子卡符号学：审视后工业时代的电子卡，史筱倩敏锐地发现区域差异（张美君，2005，pp. 60—63）。不同城市命名电子卡千差万别：香港叫“八达通”，台湾叫“悠游卡”，新加坡叫“EZ-Link”。符码命名背后，藏匿着深刻的文化意涵。香港是即食化、机械化、智能化的极速城市，悠游在此最不可能发生；在蜜蜂般忙碌的人潮中，你和他们永远只有瞬息擦肩而过的份儿。而在台湾，生活意味着温柔而淡雅的沉沦、能和快速兼容的“悠游”、浮夸以外的含蓄。若去台湾的诚品书店，必能体会到这种悠游与品味，这与香港二楼书店的逼仄拥挤，实在不可同日而语。

(4) 物符号学：敏锐把握物欲、恋物癖、消费文化给香港社会带来的冲击，如陈慧的《拾香记》。连家十兄弟姐妹的人名与物名相对，如六合与六合彩，八宝与八宝粥，七喜与饮料。从四海开始，人名就与连城生意相连：“四海办馆、五美时装、六合百货、七喜士多、八宝制衣、九杰运输，而十香，是间酒家。”（2008，p. 9）全书借家史讲述香港史，从1974年讲至1996年，连家以卖橄榄起家，从铁水桶时代发展到塑料桶时代，随香港金融中心、购物天堂、自由港发展而进步，一家老小的出生和死亡与社会媒体、历史事件齐头并进，水乳交融，如明星林黛死时，七喜出生……林林总总，一波三折，跌宕起伏，甚是好看。全书以逝者连十香为叙事视角，浸染着怀旧回忆，物之于人，有温馨亲切的喜悦和温情。王贻兴也善于写感官世界，不仅是视觉、听觉的盛宴，而且包容了味觉、嗅觉、触觉等感官体验，营造了另类空间体验。而朱天文写及青年族群“当下族”和“E人类”的物恋情结，则是另一番态度。其《巫言》写新新人类的高科物事，足足三章：《E界》、《e-mail和V8》、《荧光妹》，各种后现代物事如不明飞行物，在文字间穿梭：赛车、路上飞行器、战斗机和汽车交集、人机一体、人车一体；OK联盟，找OK，万事OK；用V8摄下影像，业余又摇晃。热衷豪奢物、新科物、酷异物、炫物、恋物、物控，喜新厌旧，换物频繁，内地、港台新人类多有此癖。此新时代的脉动，先锋作家有敏锐把握，难逃他们的法眼，叙述人与物的关系，在人性化与非人性化的矛盾力量间摆荡。

(5) 未来符号学：透支未来，穷尽叙事，仿佛对小说将死的宿命预言，做最后的搏击。但这不是科幻小说，没有外星人、机器人、怪物，还是一群人类，还是写实，只是进入拟真未来。例如，香港董启章的《哑瓷之光》，想象未来百年的子孙故事；内地王朔的《和我们的女儿谈话》，提前进入老年，和女儿辈的人对话；台湾杨照的《我想遇见你的人生：给女儿爱的书写》讲

述女儿的未来；骆以军的《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》，张大春的《聆听父亲》给尚未出生的孩子讲故事，在巨大无常且冷冽如月一般的命运辗过这个不存在的孩子之前，他将会认识父亲，乃至父系家族。当代作家们纷纷提前进入未来隧道，力求开拓写作路向。当然，香港科幻故事论集《科幻·后现代·后人类》，也关注新媒体的勃兴和发展。

指向未来，面对过去，符号的跨代组合能激发创意。潘国灵分析过香港一幅地产公司网站广告（图1），将中国工农兵革命的图像，并合于“伟大的地产信息服务革命”，“一是人民革命，一是信息革命，这个广告将两种革命，横跨了很阔时空的，压缩在一个平面上”。（2004）



图1 地产公司网站广告

这幅图运用的是拼贴混拌的后现代式叙事法，香港文艺家早开始使用此种创意法，而这也是后来“北京798”艺术作品创意的法宝。香港作家善于混拌代际符码元素，写出新意。2005年，新生代作家潘国灵和谢晓虹创作中篇《小说的i城》，向早生代西西的《我城》致敬，两代作品正好相差30周年。三部作品都敏锐地抓取到时代符号：西作再现20世纪70年代的“电话、电视、旅游、求职、制水、节能、难民、土制菠萝、葬礼、请愿等”；潘作再现新世纪的“网络、电联、手机、新媒体、失业、沙士传染病等”；谢作寓言式再现“分裂人、分裂城、分裂纪念日等”。三作不约而同都写行街，但西作暗写集体自杀请愿；潘作明写集体上街游行，理性分析香港人“上街”的含义，不是行街或逛街，而是将街道作为公共空间，成为表达诉求的据点。廖伟棠认为，香港后波希米亚带着变种嬉皮文化血缘而来：一边街头抗争，一边尝试走进制度，一切以自由个体的身份去思考及行动；一边要“番屋企”饮汤，保持家庭世俗传统；一边会“唔番屋企”上街发声去。（2011，p. 19）香港最初的嬉皮青年，精神上很快就不颓废了，只在生活方式、服装、艺术形式上还保留着颓废美学，对待享乐的态度也远较“革命青年”们宽容。香港的

岛屿气质，注定若即若离。如果非要定义，香港嬉皮更接近于一群快乐的安那其主义者，这不同于西方，不同于桑塔格所指的美国文化的坎普（camp）特色。

### 三、“杂唛时代”新人学

“杂唛”，是当代香港的符号，罗贵祥提出此说（罗贵祥，文洁华，2005），陈智德在《论七十年代的都市文学》序中也指出，自20世纪70年代起，香港本土化成形和成熟后，进入跨媒介年代，跨界与多元的文化并存，混乱与拉杂的“杂唛”，不安于位，不墨守成规，成为缝合香港人文化身份的连接点。新生代作家不拘于单一身份，像个百变精灵。如潘国灵，典型的跨文理全才，本科学计算机，硕士学文学，师从李欧梵。他写歌词，组乐队，当记者，玩摄影，主编影评，专论警匪片、枪战片，文化评论分析城市空间、景观、性、文化隐喻、微观政治、年轻人文化、消费主义、流行符号学等，文学书写与文化评论互相滋养，并与电脑、网络、数码电影音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自编自拍自写。潘国灵是捕捉时代新符码的高手，其小说可与散文随笔《城市学》第一、二集对读，都探讨流行文化、虚拟网络世界、消费主义、流行符号学、卡拉OK空间论、互联网题材歌曲等，形成复杂多元的互涉网。尽管跨界无边，但他仍然坚定地宣称，是“文字死硬派”（2010，p. 132）。新锐作家因自身的杂唛，笔下雕刻的人物，也带有跨界气质。据科学研究，人使用新科技后，大脑能生出神经树突，形成新的突触，以适应进化。而敏锐的作家们则发现，E时代的人学也有突变，类型多元，不同以往。

“压缩人”是潘国灵创造的新人种，其短篇小说集《伤城记》篇首即为《压缩人》（1998）。主人公笑生遭遇车祸，虽幸免于难，却罹患“记忆压缩”症，遥远过去像近在咫尺，往事胶着，时空错乱。压缩人好像卡夫卡笔下的人变身甲虫，荒诞而真实。为什么会变成压缩人？“笑生母亲永远没法知道答案，表面意外肇因是酒后驾驶，但真相却与酒精无关，只不过是上帝的小指头随机抽搐了一下。爱因斯坦说过，我最感兴趣是，到底上帝创作人时，他有没有选择。”（1998，p. 6）难道生死是上帝的儿戏？凡发生的事都经上帝默许？时间与记忆不可还原，缘于城市改头换面速度太快：电视剧不断翻拍，又赶不上流行的趟。1998年，电脑已升级到奔腾Ⅱ（PentiumⅡ），而奔腾Ⅰ8088落伍了；电话越来越多，号码早变成8位数。小说结尾：“在1997回归后的短短一年，我们集体经历了许多许多，香港回归、亚洲金融风暴，香港股市由历史新高跌至历史新低，楼价暴跌四成、禽流感、连串医疗事

故……这短短一年，像笑生的脑袋一样，被压缩了似的。一些事情，我们记得，因为重要，也可以是，因为时间接近。”压缩人其实是时刻压缩、高压化、后现代社会的新象征符号。

“柏拉矇”则是纯种数字人，潘国灵牌，最新出品：“在大学，我是 98031370，在朋友之间，我是 92776090（这个数字也转过好几次了），在亲密朋友、家人和恋人之间，我是 92776090+26286049（家用电话），在泛泛之交之间，我是 71168968#6248；在网上，我是 13621254549；在工作单位，我是 1356；身份证上，我是 D750XXX。我的真名你毋需知道。我的花名叫柏拉矇。我与你，总有同与不同的地方。”（2005，p. 169）柏拉矇在劳动节放假那日，溜达到街上做浪游人，遇上各色人等：纸板人做活体广告，义工兜售慈善奖券，问卷人，应买听觉劳损保险的影视店员工，潮爆少女，女推销员等；思绪被前女友阿娇牵引，又被亲友电话手机传唤，被广告公司的同事多口祖叫唤。临近尾声，才揭秘，花名拜多口祖所赐，因读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，被他就取笑为“柏拉图+阿矇”，简称“柏拉矇”（paramount）。李碧华的《胭脂扣》也写过数字化生存。如花与十二少约定的暗号是 3877，她遍寻各种证件，找不到解码线索：“一个小市民可以拥有这许多的数字，简直会在其中遇溺。到了后来，人便成为一个个数字，没有感觉，不懂得感动，活得四面楚歌、三面受敌、七上八落、九死一生。是的，什么时候才可以一丝不挂。”在数字化时代，后现代人不小心就成了数字人，以数字符号辗转于不同身份间，不再是异化为机器、螺丝钉，而简化为数字，在一堆数字中永劫回归，有所欠缺。

“口罩人”算是香港近年来的大特色。2003 年非典后，在地铁、巴士、街道上，常常迎面走来口罩人，自保不暇，退居自守：“面具不仅防止病毒，还防止我流露感情……口罩是我的墨镜。我低头不语/游离分子/（独个儿，在街道上）/呼吸着/游离分子/（千万粒，在空气中）。 ”（香港艺术中心，2005，p. 54）

“贫泪人”，潘国灵贡献的新人种。天目从不流泪，从不知道何谓喜极而泣、赚人热泪、凄然泪下等。他目睹别人哭，世界仿佛是供他观赏的。为学习流泪、刺激泪水，他每天切一个洋葱。对这怪诞的行为，恋人最初是笑着说；然后是劝、骂、怨；再到自语：“你贫泪，我贫血，你想哭，我想笑”；到最后，分手。天目体验到心如刀割，本被判入贫泪国度永久流放的他，滚出一滴泪如水晶，终于明白：“原来他需要的不是切洋葱，而是将情感切成碎片，以重演刻骨的分离与割爱。”（2010，p. 103-111）。贫泪冷漠，难有恒

久之情，活画出后现代人的某种症候。

“异次元人”，则是朱天文创造的新人种。其长篇《巫言》云：“时间运动线上绝对碰不到的人，地下人，地上人，异次元人，不同界面人，这时间，互相碰到了，映入视网膜，暗叫，有怪兽，有怪兽！假装没看见的话亦即不存在，互相是空物，飘渺过”（2009，p. 177）；“地底荧光人，出地面，煞白煞白人，挂满见光死的廉价塑胶物”（2009，p. 178）。书中还有不少类似火星文的语句，如“这么说吧我的爱，一个 E 丸 E 过还未退的眼睛，一个眼角被开大的眼睛”（2009，p. 175）。反复阅读终于明白：原来，这是“祭司打碟”的新人类狂欢场所，“地底祭场”，怪力乱神。朱天文笔下还有哇靠灵归人、摩登原始人、偶数人、畸零人。别名越多，越表明人类的自我迷失。最费解的是异次元人。次元，在日语中，即维（different dimension）。异次元则是不同于三维空间的四维、五维等高维空间，英文为“extra-dimensional”，简写为 ED 或 EDS，翻成中文是“平行宇宙”、“高维空间”，即不存在于我们这宇宙的第二宇宙，其虚拟位置与人类世界交叉重叠，但互不干涉。异次元人即平行宇宙人（parallel universe person），地球人的分身。在异次元空间里，人可以按照己愿在空间和时间里变换位置，去任何一个想去的年代，类似于跌入时空隧道。朱天文之所以写异次元人，因为体察到，在物欲化、低俗化和综艺化社会，活在“E 界”场域的当下族“E 人类”，追寻速度带来的快感、嗑药带来的幻觉、锐舞带来的发泄，热衷极速飞车，嘈杂喧嚣，肆意宣泄，衬出都市青年内心的空虚寂寞、狂躁焦虑、异化扭曲、感知麻木、内心封闭。朱天文塑造菩萨低眉的巫人世界，映衬 E 人类世界，如两个平行宇宙。她曾被人喻为卡珊德拉公主——公主被阿波罗追求却不为所动，阿波罗给其可以预见未来的能力，但是她所说的话没人信；之后发生了特洛伊木马进城事件，确实没有人信她的预言。作为作家，就算没有人相信，也还是要把观察到的、担心的事写出来。对当今世相，朱天文无法“菩萨低眉”，而要用女巫之言批判、抵抗，希冀让个体生命重获生命灵性，抵抗石化世界，得到诗意救赎。朱天心因此被王德威比喻为本雅明书中背向未来的新天使，在历史进程中面对过去，被进步的风暴一步一步推向未来。

在异次元人与平行宇宙、时间简史和繁史探究层面，董启章与朱天文相似，作为港台新锐作家代表，都勇于谋求内涵和形式的突破，别具雄心，拟冲刺当代文学的巅峰。朱天文的《巫言》和董启章的“自然三部曲”，都力求海纳个人史、社会史、禅宗玄幻、宇宙谜题等难以言述的哲思内容。不过，董启章以西方学说为基石，言物质，言宇宙，说条件，论因果。朱天文以中

国禅宗为基石，论无，知生，知机——机在于阴阳变化之先端，是飞跃的，超因果性的。朱天文，老作家而青春笔墨，很台湾，很后现代；董启章，中年作家而欲求穷形尽理之言，很香港，很反后现代。不同于大陆作家喜欢再现“文革”情结，董启章反映香港的“后 97”情结，朱天文书写“世纪末最后症”情结：“地球人硬是催眠了时间，一格一格把空间放大，放缓，放满，放停格，产生了一个与恒星年毫不相干的日历两千年。”（2009，p. 39）朱天文多再现阴性事物，并常作无性别、跨性别叙述，模糊性别话语，如自称巫人，称青年为“E 人类”，称国民党为“摩西老大党”，民进党为“约书亚党”；创造性地将垃圾分为“永生界”、“重生界”、“投胎界”和“再生界”。而董启章多再现阳性事物，喜欢探究雌雄同体问题，注重时空的多重框架搭建，形成双声道、三声道乃至四声道的对照呼应，在实然、或然、拟真世界中创设多层叙事通道。董启章的《学习年代》采取“阴阳脸叙事法”：一个声道是新法讲故事，采取时间零叙事法，省思知识性、哲理性、雌雄同体、双身变身等内容；一个声道是古法讲故事，讲述三角、四角、多角恋爱，爱恨情仇，物欲百态。朱天文的《巫言》则采取自由蔓生法，异时异地的时空交错，形成叙事的岔道和迷宫。如借“看”串接场景：去香港看歌剧，衍生出笑看“我”的六类人；看到同室帽子小姐的垃圾，衍生出垃圾分类法则，再衍生出文字的世俗化演变史等。再如以“孤独”串联故事：帽子小姐的不结伴旅行，王皎皎独游普罗旺斯，文字炼金士与俗世格格不入，前社长临终前的孤寂无助。再如借“菩萨低眉”，写江医生不介入患者；想到关云长的垂目掩帘，若睁眼则杀人；想到马英九市长的不敢睁眼等。叙事采用岔道勾连法，像无数的八爪章鱼，以无数柔软触角，串联起琐碎驳杂的信息，网罗住博大纵深的物世界。

符号学家像语言学家一样，要进入意义的调配，读解社会道德的意识价值。罗兰·巴尔特曾从符号学角度，解读 20 世纪后半叶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意蕴，例如葡萄酒、牛排、婚配、摔跤、玩具、筷子、鞠躬、恋人絮语等，别具一格。进入 21 世纪后，赛博文化使知识的传播更方便快捷，而且实现了知识交流的无中心化，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知识的圣人模式，在这种时代氛围中，文学符号必然随之而变，会诞生出新人类、新物种，产生出多元的代际符码学。在新媒介时代，有必要建立新符码档案、新人学品牌，建构新文学理论，本文算是抛砖引玉。

引用文献:

- 鲍德里亚 (2001). 消费社会 (刘成富, 全志刚, 译). 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.
- 包尔连, 马克 (2012). 数位并发症 (温美铃, 译). 台湾: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.
- 陈慧 (2008). 拾香记 (第九版). 香港: 七字头出版社.
- 黄鸣奋 (2004). 数码艺术学. 上海: 学林出版社.
- 昆南 (2010). 地的门. 香港: 文化工房.
- 廖炳惠 (2006). 关键词 200: 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. 南京: 江苏教育出版社.
- 罗贵祥、文洁华 (2005). 杂唛时代: 文化身份、性别、日常生活实践与香港电影 1970s. 香港: 牛津大学出版社.
- 廖伟棠 (2011). 波西米亚香港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.
- 米切尔, 威廉J. (2001). 伊托邦: 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 (吴启迪, 译). 上海: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.
- 潘国灵 (2000年4月26日). 计算机用语——现在式与过去式的断裂. 明报.
- 尼葛洛庞帝, 尼古拉 (1997). 数字化生存 (第三版) (胡泳, 译). 海口: 海南出版社.
- 潘国灵 (1998). 伤城记·压缩人. 香港: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.
- 潘国灵 (2005). 周六床上柏拉矇. 载于潘国灵 (编), 失落园. 香港: Kubrick 出版社.
- 潘国灵 (2010). Fort, Da 亲密距离. 香港: Kubrick 出版社.
- 潘国灵 (2010). 咬恋. 载于潘国灵 (编), Fort, Da 亲密距离. 香港: Kubrick 出版社.
- 潘国灵 (2010). 贫泪人. 载于潘国灵 (编), Fort, Da 亲密距离. 香港: Kubrick 出版社.
- 魏家欣 (2005). 回到 2029AD. 载于张美君 (编), 沙巴翁的城市漫游. 香港: 红出版.
- 香港艺术中心及 Kubrick (2005). 城志——我城 05 跨界创作. 香港: 香港艺术中心.
- 许子东 (编) (2001). 香港短篇小说选 (1998—1999). 香港: 三联书店 (香港) 有限公司.
- 张美君 (2005). 沙巴翁的城市漫游. 香港: 红出版.
- 朱天文 (2009). 巫言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.
- Feenberg, A. (1995). *Alternative Modernity: 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*. Berkeley, HJ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
作者简介:

凌逾,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 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现当代文学。

Author:

Ling Yu, professor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.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.

Email: lingyu08@163.com